

民族地区妇女反贫困实践透视

——基于贵州省猴儿关苗寨的调查

杨丹^{1,2}

(1. 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2. 厦门大学 社会与人类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贫困女性化的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 其研究主要集中在贫困理论、致贫因素、反贫措施方面。而从民族志视角对某一地区妇女群体反贫困实践进行具体书写, 不但可以直观民族地区妇女反贫困的措施与进路, 还能清楚地透视出伴随着一系列新的观念、政策或具体技术的引进, 乡土社会所引起的连锁反应。

关键词: 贫困; 女性化; 文化扶贫; 反贫困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891 (2019) 06-0032-04

DOI: 10.19488/j.cnki.45-1378/g4.2019.06.009

“天下民生疾苦无外乎贫困, 摆脱贫困是中国乃至世界历来追求的发展目标。”^{[1]33} 英国学者汤森认为: “如果一个家庭、群体或者个人得不到足够满足其生活及社会社交的食物、资源等, 那么可以认为是贫困的。”^{[2]66}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通过对贫困和饥饿问题的实证研究, 在他的《贫困与饥荒》一书中提出了贫困的权利理论, 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经济上收入低下的表现, 而且是权利的缺乏及其他条件不足造成的。”^{[3]9}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00年《全球贫困问题报告》中亦指出: 人类贫困是指缺乏人类发展最基本的机会和选择。因此, 贫困具有多元的社会面相, 知识缺乏、参与不足、营养不良、饥饿、寒冷、无助等都属于贫困范畴, 贫困问题一度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一、猴儿关苗寨妇女反贫困实践透视

反贫困与减贫和脱贫的意思相近, 由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 一些国家贫困的研究》中首次将反贫困作为学术概念提出来。^{[4]16} 随着这一概念的提出, 反贫困问题引起了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高度重视, 研究者们通过对贫困文化、贫困的代际传递等问题的研究提出: 贫困与反贫困问题是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 它关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是一个复杂而久治不愈的世界性难题。由于致贫的原因是多面的, 因此在

反贫困的过程中, 应根据具体问题制定合理的反贫困措施。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 地处西南山区地带, 海拔高, 种植农作物难度大, 是全国扶贫开发的主战场, 深度贫困、慢性贫困及农村女性贫困状况较为普遍。贵州农村女性的贫困主要表现在权利贫困、文化贫困、结构性贫困等方面, 其中文化贫困最为突出。笔者以贵州省水城县陡箐乡猴儿关苗寨女性农民画师反贫困的案例为出发点, 从民族志书写视角, 对民族地区妇女贫困化及妇女反贫困实践作深入剖析。猴儿关苗寨位于乌蒙山东麓, 据《水城文史资料》记载: “在城中七十余里的茨冲东, 当水城至安顺之要冲, 关山峭壁凿路, 曲折盘旋, 窄处仅尺许, 长十余里, 未凿路时, 惟猴儿能攀援向上, 故名。”^① 从这段描述可见, 猴儿关因其地势陡峭险峻而得名。该苗寨共有130余户人家, 均为苗族, 属于歪梳苗^②支系, 人口500余人。该村现有专职女性农民画师16^③人, 其中20至30岁7人, 30至40岁4人, 40至50岁3人, 50岁以上2人, 小学文化程度9人, 中学及以上1人, 文盲6人。此文主要将省市级传承人XXL、市级传承人LDX、职业农民画师XST三位女性农民画师家庭作为跟踪调查对象, 对三位苗族妇女从绣娘到画师的历程进行梳理, 从中洞察苗族地区妇女反贫困的措施及进路。

(一) 绣娘: 苗族地区妇女传统社会角色诠释
苗族历史上没有统一的文字, 文化传承除了口

收稿日期: 2019-09-19

基金项目: 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喀斯特地区民族生态文化产业发展研究”(18YJC850010); 2017年度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 “多元文化背景下师范生民族文化教育研究”(2017QN35)。

作者简介: 杨丹(1980-), 女, 彝族, 贵州师范大学讲师, 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文化人类学。

头文学以外,另一种形式就是刺绣,苗族刺绣造型及技法多样,记载了苗族的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民俗活动等历史文化,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史书”。

“姑娘不绣花,找不着婆家”是传统社会苗族地区广泛流传的一句谚语,强调不会刺绣会影响女性婚姻的选择。所以苗族的女性从六七岁起,便要开始从母亲那里学习挑花刺绣的技能。苗族史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七姐叫阿丢,嘴笨不会说情话,手拙不会绣衣服,妈妈心里好忧愁,嫁给谁家当媳妇?”^{[5]538}而“刺绣做得好”则包含了对苗族女性品德、能力和智慧的赞美。

XXL,女,苗族,文盲,67岁。XXL是猴儿关苗寨土生土长的苗族姑娘,自6岁开始跟随母亲学习挑花、刺绣、蜡染技能,10岁开始能自己独立缝制苗族衣服,14岁时,XXL已经熟练掌握苗族刺绣中的平绣、锁绣、堆绣、破线绣、缠绣等纹样和技法。其刺绣的龙、鱼、飞鸟、蝴蝶、花卉、铜鼓等图案惟妙惟肖。XXL成了乡里远近闻名的“绣娘”,就连邻村的姑娘也会在农闲时聚集到她家学习蜡染刺绣。同时,由于有一手好的“针线活”,XXL也成了男孩们追求的对象。XXL18岁时与同村的苗族青年L组建了家庭,育有两个女儿。但由于受交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2004年之前,XXL去得最远的地方便是乡镇集市,她没有走出过大山,也没有体验过自己挣钱,尽管她掌握了精湛的苗族刺绣工艺,是远近闻名的“绣娘”,但这些技艺只停留在满足家庭成员“穿”的需要。

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像XXL这样的妇女普遍存在,女性为家庭所作出的贡献,如照顾老人、家务劳动、生育小孩等这些无酬劳动得不到有效的重视,无形中拉大了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差距。而传统“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也让身为“家长”的男性掌握了更多的家庭和社会资源,一旦失去对丈夫的依赖,女性便容易陷入贫困之中,这种贫困包括经济、精神、心理各方面。

(二)画师:文化扶贫机遇下的身份转换

贫困一直是中国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曾通过土地改革、人民公社等社会主义运动缓解贫困,“到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仍达到2.5亿人,贫困发生率高达30.7%。”^{[6]11}中国大规模的反贫困运动始于改革开放,到1985年,“农村贫困人口降到了1.25亿,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4.8%。”^{[7]8}为了加强对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文化和精神上的扶贫,1993年12月,中国成立文化扶贫委员会。贵州省水城县就是在这背景下,将民族地区妇女的生活贫困及文化贫困纳入了扶贫攻坚战,开始关注少数民族妇女的发展

问题,将特有的蜡染、刺绣、挑花等不同形式的民间艺术结合到一起,挖掘出独具特色的现代民间绘画——水城农民画。2004年,当地政府邀请专业画家到猴儿关,组织猴儿关苗寨40余名女性参与第三期“农民画培训工程”,XXL、XST、LDX也是该培训班的成员。

LDX,女,苗族,文盲,56岁。LDX与XXL是“舅母-姑子”关系(XXL是LDX的大姑子),LDX是六枝人苗族,12岁开始跟随母亲学习挑花、刺绣。因其母亲与XXL的母亲是结拜的“姊妹”^④,两家人形成了一种相互恩惠的社会关系。LDX以其娴熟的刺绣技术深深打动了“姨妈”(婆婆)和“哥哥”(丈夫),18岁时从六枝嫁入猴儿关苗寨,与村里的苗族女性一样开始了纺纱织布、照顾儿女的生活。直到2004年,在政府文化扶贫的号召下,她参加了“农民画培训班”的学习。虽然LDX也是村里小有名气的“绣娘”,但由于不识字,她有着深深的自卑感,不敢与培训的老师交流,又担忧下笔弄坏了画纸。后来在老师和“姐妹”们的鼓励下,她做到了画笔当针、颜料当线、画纸当布,从“绣娘”变成了市级农民画“画师”。

在政府的文化扶贫背景下,猴儿关苗族妇女通过参加文化学习、作品观摩等方式,将原有的刺绣技能与现代绘画艺术相结合,不断创新和提高自身的技能,从“绣娘”变成了“画师”。她们创作取材主要来源于田间劳动场景、神话传说、民族节庆。从2004年至2019年的15年间,猴儿关苗寨的女性画师从参加培训的40余名,发展到120余名。

(三)脱贫:民族地区女性“半边天”的社会功能得以发挥

传统的社会分工表明,妇女的主要分工是“相夫教子”、料理各种家庭事务,她们的活动区域被限制于家庭内部。而经济全球化及旅游开发的影响,为苗族地区的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提供了实践的场域。在反贫困过程中,当她们为家庭、村寨和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时,她们开始逐渐融入市场体系中,她们参加各类比赛、培训,逐渐跳出了本村狭窄的人际圈子,融入外部社会关系圈。在这个过程中,妇女传统的社会角色开始发生变化,民族地区女性“半边天”的社会功能得以发挥。特别是最近10年来,这里的苗族妇女积极参与当地文化建设。到2017年,原为建档贫困户的32户画师家庭已100%脱贫,XXL、LDX、XST3位画师每个人的年收入平均为5.4万元,成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该村寨现有的20户贫困户均为老年户及未从事绘画的部分农户。由于受长辈的影响,年青一代辍学外出务工的现象也有所改善,村里最近几年不断有孩子考上大学,整

个苗寨的文化程度不断提高, 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得到有效控制和阻隔。

二、民族地区妇女反贫困的措施与进路

(一) 尊重妇女的主体性是反贫困的关键

由于受传统“男外女内”的分工限制, 妇女更多的忙于照顾家庭, 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妇女, 她们受教育的机会和受教育的水平远远低于男性, 在乡村公共事务建设及文化扶贫等事务中男性依然处于主体地位。在反贫困实践中, 如果存在性别障碍, 妇女主体性就会受到限制。因此, 尊重妇女的主体性和落实妇女的主体地位是持续对抗贫困的关键。在本案例中, 猴儿关的女性是“画师”, 但同时也是普通村民, 她们要在每一个农忙的日子参与家庭劳作。水城县地处乌蒙山腹地, 由于受贵州喀斯特地形地貌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在农业生活上很难实现机械化, 农业生产保留了传统的生产方式, 主要由邻里乡亲们相互帮忙完成。在劳作过程中, 大家有说有笑, 虽然辛苦, 但族人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日落而归时, 这些女性画师便拿起画笔, 根据白天劳作的情景进行艺术创作。画师们通常会赋予这些取材于农耕生活情景的画作非常“接地气”的作品名字, 画里的人物也有相应的原型对照。如作品《背苞谷》《讨^⑤南瓜》《挖土豆》《红芯猕猴桃》《庆丰收》《枇杷熟了》《丝瓜丰收》《春耕》等。表面上只是农耕劳作场景, 实则是当地族人之间和谐关系的一种真实写照。作为文化产品的农民画, 是融合苗族刺绣、蜡染、雕刻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特殊绘画形式, 其主要创作群体是当地的女性同胞, 女性是这种特殊的艺术表达的主宰者, 这也是女性在民族文化艺术领域的“在场”证据。猴儿关农民画师主张的绘画理念是“想画哪样就画哪样, 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正是这种随性的绘画方式, 打破了美学上的色彩搭配禁忌, 创作出了深受老百姓喜爱的作品。

XST, 38岁, 女, 苗族, 小学文化。2004年农民画培训班成员, 从事农民画创作已14年, 在多彩贵州旅游商品“能工巧匠”两赛一会比赛中多次获奖。2018年5月, 在当地政府的文化扶贫号召下, XST与同村的LBM、YJZ三位画师以“山村人才”身份, 到离家10余公里的土发村^⑥参与新农村建设。土发村为当地贫困户移民搬迁村, 由于这些搬迁户均已远离土地, 政府想借助“农民画乡”文化品牌优势, 引进农民画师, 创立农民画师工作室, 为搬迁户提供免费培训, 发展农民画、蜡染、刺绣等文化产业。为加强搬迁农户和失地农村的技能培训, 作为农民画师被引进土发

村的XST等人主要负责对搬迁农户的“夜校培训”工作, 教授农民画。政府每年给她们每人两万元专项资金补助, 所创作的作品收入均属于她们自己。

(二) 以地方性知识为先导

“文化是人们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中创造的一切财富, 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人们所具有的一切生产技能, 社会经验、知识、风俗习惯等。”^{[8]384}“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 体现在这个民族共同体的每个社会成员的实际生活中, 体现在他们的思维和行为等方式和他们所创造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上, 并以各种方式在人民中流传, 世代相继产生影响, 从而形成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8]384}一代又一代的苗族妇女依循一套祖传的知识来规范自己的行动, 他们这些经验性的知识虽然是未经任何系统性的教导来传递, 但是却足以应付他们的日常生活需求。猴儿关苗族妇女在参与文化扶贫的过程中, 用自己的画笔, 向族人和游客呈现了本民族的特色文化, 彰显了苗寨的精神面貌, 加深了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有效地传承了苗族文化。作品《醉在苗乡》《芦笙吹起来》《跳花坡》《对歌》《苗家蜡染代代传》《苗族蜡染画》《快乐的节日》《哭嫁》《夺爱》《苗族三月三》等, 主要取材于当地妇女们的生活、民间信仰、民族历史文化, 是苗族人民地方性知识和精神文化的体现。“在民间美术世界里, 宇宙万物完全以创造者自我为中心, 时空秩序完全以创造者自我为中心, 那些双手沾满泥土的农夫村妇, 希望创造一个真正的理想世界, 他们以能动的认识态度, 把外部世界纳入主观世界的秩序, 让现实事物按照他们的意念重新构造。”^{[9]278}苗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 在贵州人口分布广、支系多。居住在水城的主要有歪梳苗、小花苗、大花苗等支系, 支系不同, 其服饰也不相同, 因此当地民众一般根据服饰就可辨别其所属苗族支系。猴儿关女性创作的农民画, 多以人物为主体, 人物的面部特征和服饰特别抢眼。可见, “无论在任何社会中, 艺术从来都不是纯粹从美学内在的观点来定义的。”^{[10]153}因此, 这些女性画师在创作时, 不管是用色还是造型, 均会以地方性知识作为参照进行扩展和想象。

结语

“虽然贫困妇女化的理论最早来源于针对美国以就业和工资为主要家庭生计支撑的社会文化, 但在以传统农业为主要生计、生产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乡村社会中, 性别的不平等以及女性的相对贫困化也是客观存在的。”^{[11]4}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 虽然曾主张“妇女回归家庭”, 但

是大多数女性还是走向了社会,女性的劳动结构得到合理调整。在2016年第六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表示,亿万女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创造了光辉的业绩,要加强对女性的技能培训,提高女性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机会和能力。“尽管有关妇女在发展中的重要性观点得到了普遍的接受,但是在发展和扶贫领域如何通过挖掘妇女的潜在经济能力,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减贫的工作依然没能得到充分的重视。”^{[1][1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扶贫开发提到了治国理政的新高度,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十三五脱贫攻坚计划”》等一系列扶贫战略规划。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从“绣娘”到“画师”,猴儿关苗族妇女反贫困的实践所展示的性别意义在于:发展离不开妇女,发展要惠及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人民,因此,制定合理的扶贫发展战略,将民族地区的文化脱贫及女性脱贫作为扶贫工作的重点,应综合考虑性别差异,兼顾妇女的内心诉求,激发妇女的潜力,通过文化扶贫提高他们的基本技能,才是消除贫困的治本之策。

注 释:

- ① 资料来源:六盘水市人民政府官网: http://www.gzlps.gov.cn/cy/ldwh/ljsw/201610/t20161006_1043817.html
- ② 歪梳苗:因苗族妇女偏右盘髻,用黑色绒线作为装饰,头顶插半圆小彩梳而得名。
- ③ 这里所指的16名农民画师,是指当地政府及民众所认可的,主要在家乡从事农民画创作的苗族女性,部分画师跟随家人到沿海地区务工,每年春节或本民族节庆时也回家进行农民画创作,但绘画不是她们的主要职能。该村寨10-17岁正在上初中的女孩都在学习农民画,都会创作农民画,加上外出务工的部分画师及这些年轻女孩,猴儿关苗寨的农民画师有近90余人。
- ④ 结拜姊妹是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贵州农村普遍盛行的一种风俗,指有共同兴趣爱好的朋友相约结为“姊妹”,她们之间没有血缘上的关系,但兼具“朋友”和“姐妹”的性质。男性结拜兄弟在水城一带称“打老庚”。“姊妹”和“老庚”

是一种没有血缘的“亲人”关系,这种关系一旦形成,彼此间有事会相互帮衬,形成一种相互恩惠的社会网络,是乡土社会除姻亲和血亲之外的另一种亲密的社会关系。

- ⑤ 贵州方言,与“摘”意近,猴儿关女性的创作原则是“要画什么画什么,要怎么画就怎么画”。
- ⑥ 土发村,属于陡箐乡的一个行政村,位于六盘水到六枝高速匝道口,临近102省道和安顺到六枝高铁,是陡箐乡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现已完成一期工程,共搬迁农户167户,共731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90户,425人。

参考文献:

- [1] 陈劲,尹西明,赵闯,朱心雨.反贫困创新:起源、概念与框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9).
- [2] 汤森.英国的贫困:关于家庭经济来源和生活标准的调查[M].伦敦:阿伦·莱恩和培根图书公司,1979.
- [3] Sen A.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 [4] 冈纳·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M].顾朝阳,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 [5] 吴一文,今旦,马克,本德尔.苗族史诗[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2.
- [6] 景天魁.社会政策的效益底线与类型转变—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反贫困历程的反思[J].探索与争鸣,2014(10).
- [7] 国家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OL].新华月报,2001(11).
- [8]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 [9] 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
- [10] 克利福德·格尔兹.地方知识[M].杨德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11] 李晓云,陈邦炼,李海燕,等.妇女贫困路径的减贫溢出与赋权异化——一个少数民族妇女扶贫实践的发展学观察[J].妇女研究论丛,2019(2).

责任编辑:谢雪莲